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二二期 ——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七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1111a)

【回首文革】	四十年有感	向 红
【文革一页】	“九一三”事件碎片	韩福东
【文革访谈】	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 —— “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访谈朱永嘉	顾训中
【文革探索】	严慰冰案是何时侦破的	杜钧福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四十年有感

• 向 红 •

编者按：向红，退休干部。周宇驰（“九一三”事件之前的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之女，1970年入伍，“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未满17岁，时在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

◇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四十年前，我已经下了结论：从政治生命这个层面上讲，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父亲死去了。遗憾的是，四十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的预言。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与之四十年的渊源，我想尝试一下管中窥豹，来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

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却不能走得太近，否则深陷其中，枝枝蔓蔓，历历在目，只能看到一家一户的离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纠结？就真的“晴天碧海夜夜心”了。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的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听我奶奶讲，我们的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曾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的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是个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式——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了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四军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的空司大院。

那是一九六三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我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妈妈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一九六四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受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位于上海市地图东北角的江湾，到位于地图西南角的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的快乐；妈妈也觉得在上海的那段工作生活的日子，是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下旬。“5.16”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二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说北京的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成“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自我父亲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后来父亲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理解父亲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对革命事业抱有极大的热忱，忠心耿耿，积极努力，表现优秀，才会被挑选去司令员身边。父亲很正直，他是伤心了，不想再回北京，因为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他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就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前因后果。

据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这方面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讲用过心得。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他父亲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一九五八支边调到宁夏省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上，见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一下子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颌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一九七零年十月一日，那时我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读书（工农兵学员），一早程洪珍开车到学校，把我接去和父亲他们过节，“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还有香港流行歌曲的卡带，我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是痴迷，去了就会翻看，并且记在心里。在后来的“流放”的日子里，我发挥了自己从小爱讲故事的特长，曾经悄悄地在田间地头给一帮从“九一三”学习班放出来“劳动”的阿姨们绘声绘色地每天讲一点，她们听得津津有味，视为苦中作乐。

那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在客房的卫生间里轰隆轰隆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叠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不知是几点钟了，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实况，我坐在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讲话中“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非常孤立，日子很不好过”的那个“日”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像是没听见什么新的东西的样子，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要是我爸爸在台上讲话，我不好意思听

呢？

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也没数过，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571工程”纪要》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还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第一次觉得熟悉的父亲那么的陌生；后来慢慢想通了一点，逐渐地我们开始走近我父亲。

◇ 九一三事件与我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七一年的九月五号，是个周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象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的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都聚在客厅和张亚青阿姨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十二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迎合着，答应了，但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我性格内向，就爱胡思乱想。

十二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找我，也没有电话来，可是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什么叫“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

何等的天真烂漫。

当年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此事和自己有关，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着的是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到了，马上搬着凳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听完传达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面的几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即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幸亏我还知道人民大会堂是开大会才用的地方；天安门是节日或接见群众时才用的，平时上面没有人；“中央”二字对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应该在长安街上的新华门里面。

何等的幼稚可笑。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没头没脑，倔倔地说了两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

以至于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对我很“感冒”，以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的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这个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十七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坐下来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

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教导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八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是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的境地，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不幸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 九一二之夜

很多人描述过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也听出了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他不是“党办的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痛定思痛，接下来的四十年里，随之而来的疼痛，像是在心底慢慢融化，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9月10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12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当然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同时被搜去的还有一块林立果送的劳力士金表，据说世界上只有60只，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一九五七年一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以前哥俩碰在一起就经常辩论。

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告诉他，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

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应该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此时，他只有安慰哥哥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他反驳道：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就在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了”，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但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

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据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七一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于在信里的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们俩人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俩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 九一三与今天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于义当死，为义所在；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也曾经青涩过、失落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有“破罐子破摔”。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的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尽力了，他想做到忠孝两全。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去遵循道义，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虽死犹荣。

四十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571工程”纪要》中不难发现，也许除了可以从中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大政背离了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571工程”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真话，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的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善于独立思考，终将难掩其独特的锋芒。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它的历史使命也没有终结，对于专制的统治者来说，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会满怀眷恋地俯瞰这片大地，一定会深深关注这片大地上的风云和四季，他们一定希望党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国家有序发展，一定希望军队越来越强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今年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同时，我们没有忘记三十五年前的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额手称庆，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亲他们没有完成的心愿。所以，请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四十年前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吧！

~~~~~

## 【文革一页】

### “九一三”事件碎片

• 韩福东 •

9月12日中秋节，付晓晓是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度过的。第二天，就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的日子。

40年前，北京红卫兵付晓晓还在内蒙古农村下乡劳动，他感觉到形势突然紧张起来，9月底回京后，就从高干子弟朋友处听到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的消息。

“当时非常震动，对很多事情开始重新思考，更加不盲目了。”付晓晓对南都记者说。

40年后，付晓晓和另外5位当年的北京红卫兵，来到温都尔汗。这一天晚上突然停电，他们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几家小旅馆中，选择了稍微像样的一个住下来。天冷了，他们穿着毛衣毛裤，点着蜡烛，拿出月饼和酒……摇曳的烛光中，突然又看见几个中国人。

双方紧张对视了一会儿，付晓晓说出了一个人的姓氏：这不是老李嘛？！对方正是李冰天——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总参谋长、“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李作鹏之子。与李冰天一同前来者，还包括“林彪反革命集团”另外几名主犯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的后人，以及林彪女婿张清林。他们开始聊了起来。

如今九一三事件仍有很多未解之谜。想要完整展现脉络清晰的拼图，尚有难度。林彪出逃时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经摔成了碎片。我们所能提供的，也只是有关这一震惊国际事件的真相碎片。

◇ “江青不敢动，只有动张春桥”

林彪与四人帮矛盾公开化，毛泽东对江青的复杂态度让这种博弈有了空间

所有讲述“九一三”事件的历史文献，几乎都从1970年秋于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开篇。林彪派系和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冲突，让庐山成了一个批斗大会场，并为林彪派系的全盘溃败埋下了伏笔。

而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吴法宪（时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等人已多次向林彪汇报，江青对林彪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没有突出“阶级斗争”甚为不满。

毛泽东对江青的复杂态度，让这种博弈有了空间。吴法宪之子吴新潮当年也目睹听闻不少父亲和江青、姚文元等人的冲突。他近日对南都记者说，中共九大前后，他多次看见汪东兴（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办主任）等人与父亲聚会，主要针对“四人帮”，批判得非常厉害。他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说上海现在是独立王国，搞八个样板戏，把剧组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十几岁女孩子戴上手铐脚镣上街游行，对上海要造大飞机、“放卫星”之类也有批评。

这种话听得多了，吴新潮有一次就对父亲说：江青是毛主席夫人，你们这样干行不行？吴法宪回答说：傻孩子，没有毛主席撑腰，我们怎么敢这么干？回忆这段日子，吴新潮说，现在看来吴法宪等人当时的观点完全是一种误解。这中间，作为毛泽东身边负责生活和机要的汪东兴，给大家传递的信息很重要。

吴法宪本人，也在回忆录中提及，在林彪支持下，他和黄永胜（时任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去毛主席处告江青的状，“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林彪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关系此时已经紧张。吴新潮听说的一个消息是，毛泽东在林彪成为接班人后，曾问过他，在林彪之后，让张春桥接班行不行。林彪对张春桥不满意，毛泽东问：那你觉得谁可以？林彪说，井冈山的那帮红小鬼，意思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毛泽东认为林彪在结党营私。”

九届二中全会前的一件事，更加深了林彪派系对张春桥的不满。林彪研究者牛先生对南都记者说，在1970年春天，上海一些老人在座谈会上推举张春桥，简报上报到中央后，一位毛泽东身边的同志将其通过陈伯达转交叶群。叶群为此召集11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开会，准备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与张春桥摊派。“叶群说服林彪‘清君侧’：江青不敢动，动姚文元没意义，只有动张春桥。”

#### ◇ 关于“三个副词”的争论

吴法宪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距离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还有十天，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张春桥与吴法宪系就“三个副词”发生争论。张春桥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一种讽刺”。吴新潮说，这实际上是张春桥把矛头引向林彪，因为这三个副词是林彪所说。

1970年8月23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做了长篇发言。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此前叶群、陈伯达等人组织起草的讲话稿中，将张春桥批得狗血喷头，但林彪没有按此讲话，甚至于连“张春桥”三字都没有提及。“他讲话中，有大量歌颂毛主席天才的段落，只有几句话不点名批评有那个司令部的人反对讲天才……80%的人没有听懂。”

据吴法宪晚年回忆，他在林彪讲话后听叶群说，林彪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请示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遭到张春桥的反对，他可否针对此在开幕式上讲几句。毛泽东说，“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

但是叶群发现没有点名，很多人没有听懂，开幕式后召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要他们继续发言，并播放林彪讲话录音。“放风点火了一天，大家都知道林彪说的是张春桥，开始要揪斗。”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

陈伯达、吴法宪等人，还开始搜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林彪等人关于“天才”的语录，交会议秘书处打印。吴法宪当时的一句名言，或许很能代表批判张春桥热潮时的一种认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为此到毛泽东处告状。“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毛主席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但没提自己的意见。

九届二中全会破例休会了两天。毛泽东拿出《我的一点意见》，通篇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语录，称其“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在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出笼后，汪东兴也做了检讨，并很快过关。陈伯达则不得翻身，闭幕会上，中共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审查。

#### ◇ 毛主席不满吹捧林立果

林立果被称为“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吴新潮现在认为，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反对“天才地”等三个副词，或许和林立果此时在空军被吹捧为“超天才”有关。

九届二中全会前，被安排在空军工作的林彪之子林立果，因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做“讲用报告”，而被称为“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第四个里程碑”，甚至有了“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的说法。

据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二版），“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有一些细节显示出，毛泽东对林彪已有意见。

据汪东兴回忆，196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备战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

到了1970年，关于八一建军节社论，也引发争议。陈伯达等人不同意社论中的新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认为应该恢复过去一贯的提法：“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张春桥表示反对。汪东兴奉周恩来命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未置可否，要汪东兴画圈后退回。再次请示后，毛泽东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么？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

这句话，毛泽东此后在1970年南巡时多次重复，显示出其对该问题的在意程度。

但这些深隐于心的想法，不要说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就连政治局常委们，也多不曾察觉。

#### ◇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

毛泽东否决了政治局的多数意见，坚持自己不当国家主席

在1970年，设不设国家主席突然成了一个问题。刘少奇前一年底已经在狂风暴雨般的批斗声中病逝，他的国家主席职务也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撤销。当时代理国家主席的人是董必武，

据吴法宪晚年回忆，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林彪是什么态度呢？按吴法宪的说法，1970年5月17日下午，吴法宪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时，提起毛泽东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当即口气非常肯定地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

在吴法宪看来，林彪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也比较合乎情理。原因之一是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地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据《周恩来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8年2月版），在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林彪仍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他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但毛泽东否决了政治局的多数意见，坚持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到了1970年8月22日，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一天，中央政治局5常委在庐山开会时，“除毛泽东外，几名常委都表示”应设国家主席，周恩来甚至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后，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

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很快获得多数小组的通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小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毛泽东曾批评关于国家主席设立的问题偏离了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但此后，在三项议程之外，就“天才”问题批判陈伯达成为全会的议程主轴。

林彪一直没有写检讨

陈伯达受到批判后，吴法宪乃至林彪夫人叶群都曾写过检讨

九届二中全会之前，陈伯达已经明显觉察出毛泽东对他冷感。据他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晚年回忆，陈起草的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初稿，毛泽东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原封不动打了回来。陈伯达相对注重经济发展的主张，被批为“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当时是党内第四号人物，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地位尚在康生之上。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批陈整风”开始在全国展开。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0天后又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反对陈伯达具有敲山震虎的作用。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1月版）称，“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的发表为标志，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实际上已经转化为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只是，当时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还说，“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公开发表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也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

吴新潮回忆，甚至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吴法宪都没有感觉到毛泽东要把林彪搞下台。

陈伯达受到批判后，吴法宪乃至林彪夫人叶群都曾写过检讨。但这种检讨并不为更多人所知。吴新潮说，他当时在外地当兵，并不知道父亲检讨，“我家的秘书都不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还召见了吴法宪等人几次。

林彪一直没有检讨。吴新潮认为，林彪不检讨“表现出他政治上的不成熟，太个性化了”。

◇ 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两面性

“林彪当然挺毛，但他也有两面性，认为应该有个界限，文革那一套别搞到军队里来”

林彪研究者牛先生说，林彪平型关战役后受过严重枪伤，解放后也一直吃药止痛，身体极差，在苏州、大连等地来回养病，他患有植物神经紊乱症，怕光怕水怕风，还头痛失眠。“文革”开始将矛头指向刘少奇后，周恩来等人出面请林彪“出山”，林彪最初并不愿意“接班”。

林彪不愿“接班”的表态，也曾体现在公开发言中。但这是发自内心，还是故作姿态，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吴新潮也表示，林彪自1959年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后，就开始在部队里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到了“文革”初期，造神运动更加登峰造极，“林彪当然挺毛，但他也有两面性，认为应该有个界限，文革那一套别搞到军队里来。”

吴新潮经常去林彪家看电影，林彪话不多，有时拉拉他的手，他感觉林彪身体没有传说中那么差。林彪夫人叶群同时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吴新潮认为她是一个爱出风头、爱管闲事的女人。在林家卧室内，还挂着林彪赠叶群的条幅：说话莫罗嗦，办事莫越权。

另外必须提及的人物，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吴新潮和他互动很多，觉得他与他的父亲一样，是个有些内向的人。在他眼中，林立果是个一天到晚搞技术的人，对无线电着迷，屋里堆满了摄影器材，林彪还给他布置任务研究可折叠自行车，以备战时之需，“这是林彪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

吴新潮认为林立果的另一特点就是西化，看很多别人接触不到的国外文艺作品。任由社会上去破四旧，他们却可以在家欣赏梁祝的唱片。“我们这些孩子不同于一般理解的文革概念：忠于毛主席，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不是这样。林家从来不搞早请示晚汇报。”

在吴新潮看来，公开的信息显示出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很荒唐”：“虽然我父亲说了‘两个一切’（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但事实上林立果在空军没有军权，谁也调动不了，就他们四个人（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最后搞跑了一驾飞机，还是背着首长。”

还有很多困惑，让吴新潮觉得九一三事件像谜一般，他希望能早日公开坠落“三叉戟”的黑匣子。

#### ◇ 从“九一三”事件觉醒

九一三是不平凡的一天，不仅令全世界受到巨大震动，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不能遗漏的信息是，在“九一三”之前，从8月15日到9月12日，毛泽东一直南巡。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南巡期间多次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不断提及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与党内分裂，称有人看他老了，快要上天了，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夺权。而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毛泽东似乎对林立果等人的预谋有所察觉，提前赶回了北京。他回京第二日，林彪夫妇和林立果就仓惶登上三叉戟飞机，并最终折戟温都尔汗。

1971年的国庆，异常得连作为惯例的大型游行都取消了，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设置也被撤销。虽然林彪之死被封锁了一段时间，但坊间已经有种种传言开始流布。

作为高干子弟的付晓晓，9月底就听闻了消息。罗箭，罗荣桓长子，自己在四川下放劳动，所以大概直到1971年底才知道此事。“我们知道的进修已经相当晚了，比正式传达早不了几天，算是提前兴奋了几天。”罗箭对南都记者说，他在四川与北京通长途，听到很隐晦的表达，说经常出来的那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尤其是国庆都没有出来，让他看报。

此前鲜为人知的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几个受到审查的头面人物之外，受到牵连的人事实上非常多，他们更多集中于军队内部。

吴新潮也在今年9月13日前后，去了温都尔汗坠机现场。他认为，九一三是不平凡的一天，不仅令全世界受到巨大震动，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很多人从这天开始真正反思“文

革”。对于今年九一三研讨升温却未被“扣帽子”的现象，他认为反映出时代的开明进步。

□ 来源：南方都市报

~~~~~

【文革访谈】

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
——“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访谈朱永嘉

· 顾训中 ·

被访谈者：朱永嘉 访谈者：顾训中

访谈者按：上海在“文革”10年间的军政关系究属如何？“九一三”事件前后有何变化？

朱永嘉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并一直负责写作班子的工作。

“九一三”事件40周年前夕，笔者访谈了“文革”期间任上海市革委会常委的朱永嘉，就此前此后上海地区军政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究。

顾：朱老师，“九一三”事件40周年快到了。我很想听听你对这一事件在当年上海发生的影响的回忆，以及在此前后上海军政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朱：上海的军政关系，先是与警备区的关系。因为各地都是警备区、或者是省军区进行“支左”。上海开始也是警备区执行“支左”任务的。

上海与其他地方情况不一样的是，自从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特派员身份到上海来以后，上海的“文革”就直接受到中央文革的指导了。相比较而言，上海的运动就有点独立性了，在这种状况下，有些重大问题还是得到了部队的支持。譬如说，“一月夺权”时关于电台的管理，对外通讯也是需要部队来帮忙的，民航的管理也是要部队来管的。

我开始参加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活动的时候，军队方面的代表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廖政国是四方面军的老同志。他曾担任20军军长，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他与陈丕显的关系比较好，因为原来都是来自新四军和三野的部队。在战争中，他的一只手残废了，腰部受过重伤，身上还穿了一件钢丝马甲。1967年初我和他一起参加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的几次会议。他讲话不是很多。在会上我看不出他们和市革委有什么大的矛盾和分歧。后来分歧的产生是由于警备区内部的矛盾。因为警备区内的造反派起来了，廖政国就把这一派压下去了。

顾：这些造反派是不是警备区机关里的一部分人？

朱：是的。

顾：警备区领导中有没有同情或支持这些造反派的？

朱：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是支持这些干部起来造反的。

顾：这些造反派的目标就是对着廖司令？

朱：当然是罗！提意见么就提到负责人、一把手那里去了！副司令员张宜爱、副政委李彬山，都是同情造反派的，这样矛盾就出来了！

军队里的造反派受到压制，被看起来、管起来了。情况通过游雪涛小组（指由原上海《青年报》记者游雪涛在“文革”期间组织的一个专门从事情报收集的小组织——访谈者注）反映过来了。当时小组里负责联系军队的是夏运，原来也是《青年报》的一个记者。情况反映过来以后，中央文革方面就认为，不能这样子镇压。这样，上海市革委会就跟廖政国的关系对立起来了。上海与廖政国的对立倒不是因为上海的运动怎么样，而是因为军队造反派起来以后对待军队造反派的态度问题，两方面发生分歧了。当然，他把陈丕显请去参加警备区的党代会，还让他坐在主席台上，多少有一点为了跟市革委会唱对台戏。其实，那时陈丕显的警备区第一政委职务并没有撤职，本来也算正常，但市革委会的人看了肯定不高兴。

顾：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朱：1967年上半年的事情。

顾：那是市革委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

朱：是没多久！市革委会成立时的几次会议我都参加的，在外滩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这几次会廖政国都是来的。后来看不到他了，他不来参加了。军队有一个情况，他并不听你的。尽管你张春桥后来当了警备区第一政委，他还是听南京军区的。

这种情况下，两边的关系就搞僵了。这样，上海的“支左”虽然有警备区的干部，但是不多。

就上海的情况来讲，所有的部队“支左”干部不是靠原来军队单位的指挥，而是要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指挥。这个情况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实际上，上海工作的许多意见是从中央文革直接下来的。

照道理，上海成立市革委会，军队方面当头的应该是廖政国。但由于廖政国的缺席，实际上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这一点廖政国也不高兴。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就展开了。

游雪涛小组还从军队内部反映了很多情况。后来这被张春桥中止了。张认为，我们去摸军队情况不好。张把游雪涛在军队中的活动停下来了，缓解了我们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和关系。

这样，军队的“支左”就不找警备区了，去找空四军了。

顾：这是市革委会主动去找空四军来参加“支左”？

朱：是这样的。所以，那时上海市革委会的警卫都是空四军派的，复旦大学的“支左”是空四军派的，《文汇报》的“支左”也是空四军派的。许多要害部门的“支左”都是空四军派人来的。

顾：这样，市革委会与空四军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朱：更加密切了。而警备区、廖政国退出了，变成了这样的状况。

一直到1969年“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王维国才参加市革委会，担任副主任，相当于过去市委书记处书记这样一个级别。在康平路（原上海市委办公所在地——访谈者注）也给他办公室了。

所以后来“公革会”（指市公安局内部造反派组织“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访谈者注）的接管都是靠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分工主管上海政法部门。

到空四军来接管以后，公安系统这个事情就归王维国管了，把原来在公安局夺权的造反派都镇压下去了。造反派找我，我已经不可能再向张春桥、向王维国报告了。这个时候，市革委会已经明确由王维国主管政法系统工作了。他是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代表军队的还有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负责农口；副政委李彬山，负责民兵。

原来警备区机关中那些造反的干部在警备区站不住了，就出来了，由市革委会接纳了，参加“支左”。所以，在市革委会领导下参加“支左”的警备区的人，都是军队的造反派，实际上都是给廖政国赶出来的人。包括在铁路系统“支左”的警备区的人，也是军队造反派。他们跟铁路系统造反派谢鹏飞、万景荣这批人的关系很好。还有这么一层关系。而警备区本身倒脱身了，不管上海的事情了。相反，市革委会与警备区双方的矛盾很尖锐。

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访谈者注）到上海来，廖政国是告状的。当然，许世友是帮廖政国的，跟张春桥谈不到一起去。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许世友不是在大别山吗？不是毛派张春桥去请他出来的吗？外面传说，张春桥到了合肥以后，派直升机去接许。实际上是张亲自坐着直升机去接许世友的，这点人家都不讲。接的时候，张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政委来接司令员噢！后来毛对军队干部讲话时说，政委接司令员，党史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我，一次是张春桥！

许世友到上海以后，杨成武、张春桥一起陪许去见毛。到了毛那里，杨、张退了出来，让毛与许直接谈话。许世友跪在毛面前，毛扶他起来，做他思想工作，安抚他，讲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的道理。最后许世友出来时很高兴，对杨成武、张春桥说，我到大别山去打两只豹子，一只送给杨成武，一只送给张春桥。后来外面传说，打一只兔子送给张春桥，打一只豹子送给杨成武，完全没有这回事。

张春桥拿了这只豹子，剥了皮，豹子肉请警备区的人来吃了，皮还做了个东西放在家里。到“四人帮”倒台以后，警备区的人来抄他的家，把这个东西拿走了！我是从他的孩子那里知道这个情况的。

所以从当时的情况看，上海市革委会与警备区关系处理不好，包括上海与许世友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是这样一个过程。

顾：我插一句：当时部队“支左”大体是怎么分工的？刚才说了，警备区负责农口、民兵、交通，空四军负责政法、宣传……

朱：空四军管的还有大专院校、民航。

等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与空四军的关系就不好了。

顾：也就是说，此前你们与空四军维持了这么一种相安无事的格局，而与警备区摩擦多一些，因为你们用的都是人家造反派的人。

朱：到了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阵线就很鲜明了。因为王维国在会上的表现，都听林彪他们的话。不光是王维国，上海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其他一些人，包括杨富珍（原上海纺织行业劳动模范，“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访谈者注）跟着他们了，陈敢峰（学生造反派、时为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负责人——访谈者注）也跟着他们了。这就说明，张春桥系统、空四军系统在市革委会内部也有了分化。

这以后，王维国就不来管事了。

顾：我想问一下，当时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在他们参加会议回来以后，你有没有听说一些情况？

朱：情况我还是知道的。包括跟徐景贤聊天，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他们多多少少还是透露一点情况给我。心里大体有数，但细节不是很清楚、很具体。

我那时在复旦工作，复旦负责“支左”的是空四军的方耀华，我跟他们关系还可以，我还得靠他们工作呀！

我管复旦的事情是1969年以后的事情。为什么呢？作为写作组，你要搞各种各样调查研究，你要翻阅许多书，你不能不依靠高校文理科教师的队伍啊。有的时候毛要我们一些西方的、古典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例如天体怎么运行，这类书好多，不是一本两本。那就把理科的老师包括苏步青、谷超豪这些老专家都请出来了。

顾：那时你在复旦有什么具体职务吗？

朱：没有什么职务。正因为没有职务，我这样一抓以后，他们就告状了，说是我在中间插了一杠子。他们告到市革委会文教组去了，文教组反映到徐景贤那里了，徐景贤就反映到了张春桥那里了，说我“手伸得太长了”。张是这么说的：他“手伸得长”，无非是想做事情，也没有别的。那就让他去兼个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吧。这样，我就在复旦有了个正式职务。

顾：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朱：大概是1970年的事。

后来姓杨的那位走了以后，是徐海涛做了文教组负责人。徐是警备师政委，他也是支持造反派的。

顾：就是他1967年1月底带着警备师的部队到复旦大学去救徐景贤的？（指该年1月底，以复旦大学学生造反组织“红革会”为主发起“炮打张春桥”，绑架了徐景贤。警备师按张指示派兵去复旦大学援救——访谈者注）

朱：就是他！我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好。

他在文教组当家的时候，我在复旦的工作就好做了，什么事情找他就一口下去了。后来他

不具体管那个事情了，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空四军在市革委会慢慢地退出了，王维国不到市革委会来管了。但空四军在下面单位的“支左”人员还没有动。那样，就把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调来了，作为军队代表参加市革委会，担任了副主任。从此，军队方面就由他负责了。周纯麟也是四方面军的，打过不少仗。他原来是南京军区的炮兵司令。他与廖政国对调，廖去南京军区任炮兵司令，周纯麟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

所以，军队干部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有个调整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是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来的，但是因为造反派的原因，关系搞得不好；后来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来；最后又是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来。

顾：这么说吧，具体到下面单位里与“支左”人员的关系，并不取决于上面。

朱：决定于我们的工作。大家一起要把工作做好。譬如说，画历史地图的工作，那是毛主席交下的任务啊！我想把这项工作做好，他们也认为，能够帮助把这个工作做好也是很光荣的事情。

当然，在某些问题上我们也是有分歧。譬如说，中央开教育革命座谈会，我们上海也去了很多人。去开会的时候我给他们定了个调子：1971年是“黑线专政”。这是我当时定的调子。上海去的人是根据我的这个调子讲的。但是空四军去的人不一样，他们根据林立果那个系统，定了另外一个调子，说是“红线专政”。这样一些大的认识方针上的差异也还是有的。他说他的，我们也不反对他，我说我的。谁是谁非，最后由中央来定。这不是我们两个人吵架可以吵得下来的。这点上我们大家还是相互尊重的，他们尊重我们，我们也尊重他们。

在基层里面，大家并不是你想整我，我想整你，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是这样一种状况。矛盾主要在上层，不是在我们这里。

“九一三”事件以后要进行清查了，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顾：你曾经提到《文汇报》文章与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纪要》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是后来清查时牵扯出来的事情吧？

朱：都是开始清查之后发现的，当时并没有认为是什么事。

1971年1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路线、政权和世界观》的文章。文章大样送到兴国路市委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那里时，张认为有问题，要求设法了解文章背景。领受任务的是曾经在空四军服役的吴××。他回来报告说，文章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后来事实证明，他所提供的是一个假情况。事实上，这篇文章与空四军的“卫东鹰”无关，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也毫无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促使上面作出反应，要写批评文章了，这就是发表在《文汇报》3月16日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是由写作组文艺组的高义龙执笔，具体是徐景贤奉命抓的，是徐下令让《文汇报》用同样的版面和篇幅刊登。这个过程在我们写作组内部是公开的。然而，吴××此时却又把与“方岩梁”文章有关的写作背景情况插给了空四军“卫东鹰”那儿，被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个“信号”，促使林立果加速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策划。1972年1月，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中有李伟信的笔供，说“林立果同他谈了上海《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有来头。“既

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据此，林立果加紧谋划《五七一工程纪要》。

现在来看这两篇文章，都是空话套话，也没有什么政治针对性。当时来看，也只是一般的理论文章，并没有指着对方鼻子骂的话，一句也没有。而且对象也搞错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吴××这个人实在是做了件事，造成这么大的后果，谁也没有想到过。

顾：当时你是在什么场合比较正式地听到了“九一三”这件事情的？

朱：好像就在“九一三”不久，徐景贤传达的。是在锦江小礼堂，市革委会范围里传达的。我有印象。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看到后很吃惊的。

顾：你们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朱：当时觉得林彪为什么要这么做？想不通！怎么会走这么一条死路？这个人怎么会脑筋搭错啦？非常不正常么！没有必要这样做么！你作检讨就是了么！

印象深刻的还有毛讲的那句话：江青来得晚了，毛说了句“王者无私也”。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我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翻书去了，一看是这样的意思，懂了毛与江的关系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两个人住在一块儿，毛讲了什么，江就出来传达了。现在江是政治局委员了，是公对公了。

顾：这话是“九一三”事件传达时说的吗？

朱：当时把政治局会议怎么讨论的内容都传达给我们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内容？因为有张姚的关系。把一些政治局讨论的细节都传达了，包括毛拍手鼓掌，说这是最好的结局，后来喝茅台酒，大家很高兴，这些细节都知道了。

顾：上海这边应该说是属于中央文革这一派的，当时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兴高采烈的“好”的感觉？

朱：没有感觉什么“好事”，这是倒霉事啊！整个“文革”都受到很大伤害啦！毕竟是“林副主席”啊，不是别的人啊。

顾：是不是可以说，到了上海这个层面，并没有两个司令部、两个对立路线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朱：这个感觉有：好危险！脑袋掉了也不知道！他们那么狠！这种想法是有的。但是你说的，什么胜利啊的感觉是没有的。什么胜利？是灾难。我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在清查过程中，我对复旦“支左”部队的方耀华他们就没有说过一句坏话，能够留的人我都留呀。我并没有把这个当成两个营垒，非要弄个你死我活的样子。

当时我脑子里想到的问题，这事情总不太好办吧？不是件很光彩的事情。

顾：听到毛高兴得拍手、周提议喝茅台酒这样的细节，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朱：感觉林彪这件事情是了了，但将来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九一三”这件事情的一个结果，就是空四军的干部慢慢地退出去了。

顾：这就要讲到清查的问题了。对他们是先进行清查、还是退到部队以后再进行清查的？

朱：像复旦的“支左”人员是退回部队去清查，我们不管的。整个上海的清查运动是王洪文管的，具体的清查工作是戴立清（原是王洪文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核心成员，后成为上海市革委会重要成员——访谈者注）在抓的。

王洪文管清查工作以后，与许世友系统的矛盾也很尖锐。空四军的干部与林的关系很密切，按照毛的政策，清查的同时，在处理时需要慎重。因为“九一三”事件又牵涉到了九届二中全会时，那些大军区司令当时都写信向林表态，包括韩先楚啊、许世友啊、杨得志啊……还有四员大将（指当时参与军委办事组领导工作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访谈者注）以下的许多干部，空五军陈励耘、空四军王维国他们下面都还有很多人，怎么看待呢？他们都是革命过来的。对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应该正确对待，不要揪住那些历史问题不放。他们打过仗，有经验，若要打起仗来，我们还应该用他。他们还能立功劳。关键在于你相信不相信他。

许世友当时在处理空四军干部问题的时候，将所有原来空四军的高级干部都赶光，另外自己派人。那就在这个问题上跟王洪文发生矛盾了。王洪文认为不能这样干。张春桥倒是态度比较鲜明的。他认为，不能怪下面干部，主要是上面的事情呀。

顾：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呢？王洪文处理时是采用了怎么一个办法呢？

朱：他主张原来的班子不能大动，能够保留尽量保留，因为它有个工作连续的关系。人都换了，就会发生工作无法连续的问题。包括在杭州处理空五军的问题，他和许世友也有矛盾。那个时候，毛主席要王洪文在上海处理空四军的问题，到浙江去处理空五军的问题。这两个军都是与小舰队密切相关的重点区域。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面，许世友是一刀切，统统下去。王主张大部分保留，不要再派人了。

顾：这已经不只是处理参加“支左”的部队人员了，而是部队领导班子的处理问题了。

朱：实际上，这也是许跟张发生分歧的继续。王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秉承张的意图办事。

毛泽东几次想唱“将相和”，始终唱不起来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两个人的传统不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所以，思考问题的方法、处理问题的手段都不一样。这样一来，你要完全合在一块儿，相当难。有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张春桥不想“唱”，他很想“唱”。许世友也不是不想“唱”，他也很想“唱”。他打个豹子送给张春桥就是想“唱”。他们一起喝茅台酒也是想“唱”。但是，许世友喜欢的那一套东西不一定张春桥喜欢呀。许喜欢喝酒，张不喜欢喝酒。许送了一箱酒给张，张叫秘书何秀文退回去。何秀文就作难了，只能放在角落里，张看不到就算了。

还有一个差异，部队领导干部看不起文人：你们无非摇摇笔杆子，没有上过战场，没有拼过性命。我们是生死场上过来的人，大家都是同生死、共命运的人。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同张春桥那种只讲工作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和油很难交融。不是不想做，大家都想做。后来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毛泽东批评了许世友，许世友也慌呀！

顾：许对毛的批评不能不听。

朱：是呀。所以，听说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上海轻工业局的头头马振龙正在找对象，他赶忙派夫人田普到上海来说，我有两个女儿，嫁给马振龙好不好？让他挑一个。这就是军队干部，表现得那么直！他对毛要求的“将相和”没有什么招数，把这种事也拿出来了。

顾：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朱：是八大军区司令调动以后的事情。所以你想想看，他已经调到广州去了，跟上海距离那么远了，也还是想改善关系，不是不想改善。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嘲笑他，而是分析他的性格。他不是从思想、观念上想办法沟通，而是用这种事情来表现自己的态度：我态度算得上是好的了吗？你还要我做什么样的事情呢？已经表示到这个态度了！

顾：是啊。

朱：当时马振龙也感觉不是个味道了。因为那时马振龙已找到对象了。

顾：那么，王洪文和许世友在清查中的分歧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是王知常（时为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访谈者注）告诉我的。我没有参加清查工作。这一工作从头到底我都没有参加。我做的工作不是这个内容。王知常是跟着王洪文一起到杭州去的。军队干部之间那一套拉拉扯扯的关系王知常看不惯，不愿意参与。军队干部的出身、经历自然而然形成了那套东西，外面的人是加入不进去的。他们大多是从底层社会奋斗出来的，自然而然有着底层社会的人的那种习性，一下子改不了的。林立果正是利用这种观念，能在空军系统搞一套他的东西。

顾：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是按许的思路做、还是按王的思路做？

朱：当然是按许世友的思路做了，因为是许在南京军区当家的呀。

顾：那不是毛亲自派王洪文去处理的吗？

朱：是啊。但那时的清查工作都是南京军区在主管，空军司令部门已经靠边了，上面管不了了。在这个状况下，许世友就把他们的人往里面插。王、许两个人有矛盾，可以一起喝老酒、一起出去打猎，但是涉及人事问题，对不起，许世友寸步不让。王洪文最后也没有办法想，毕竟南京军区是许世友在管，你不能动他啊。

“文革”初期，毛要张春桥去南京保一下许世友，做一下南京两派“好派”、“P派”的工作，要他们联合，他去了，也做了一点工作，但是许世友并不买账。他的想法是：我要你们来保啊！

顾：最后我还想问一下，“九一三”事件以后，在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代表军队出任市革委会副主任之后，上海的军政关系有什么变化？

朱：周纯麟是在1970年5月来上海警备区工作的，真正参与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那是

在6、7月了，6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12月，担任市革委会副主任。他来的目的是改善上海地区军政关系。不久，王维国因林彪问题与市革委会疏远了，他就顶上了这个位置，作为军队代表参加市里的工作。

从我与周纯麟相处过程看，他是想改善警备区与上海市革委会的关系。他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革委会副主任以后，市革委会的许多会议他都参加。有一段时间，上海市委书记们每天上午都有政治学习活动，他都来参加。那时，我辅导他们读马列经典著作，读毛泽东要我们标点的古文。休息的时候，他与我闲聊，讲他参加长征的故事。他曾经是陈昌浩的警卫员。他介绍说，红军到一个城市，陈昌浩第一件事便是找当地报纸看，了解当地和全国的形势。给他的任务就是找到当地尽可能多而且是最新的报纸看。每份报纸陈昌浩都看得很仔细。周纯麟为人非常平易近人。他要我们编的党史教材也送给他们看，我就送给他了，他给我们讲四方面军的故事。有一次，周纯麟住华东医院，肾脏有一个囊肿，开刀拿了。我去看望他，送他给毛主席标点的古文，他可高兴了。所以，在他担任警备区司令员期间，上海地区军政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当时，市革委会的警卫部队又换成是警备区的人了。

抓了“四人帮”以后，这些警卫人员又成为监管我们的人。我从日本回国，被隔离审查时，就被关在警备团在大场的营部。

所以说，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不能改变上级部门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拿我个人来说，只能是听天由命。

□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

## 【文革探索】

### 严慰冰案是何时侦破的

• 杜钧福 •

严慰冰案是文革初期重要案件之一，是陆定一案的案中案。事出中宣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她从1960年3月到1966年1月，以投寄匿名信方式攻击叶群及林彪一家人。但是几部文革史对此案的细节均语焉不详。

对于此案侦破的经过，最具体的描述来自《王光美访谈录》中黄峥的说法。

“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

在《王光美访谈录》发表前，很多材料，如荒坪撰写的《我的外公陆定一》也是这样说的，但未说明事情发生时间。而另一些描述此案件的文章则直接从1966年2月彭真招陆定一到他家去，告之以严慰冰匿名信事说起。陆定一当时表示不知此事。从这些文章的描写，似乎公



安部是刚刚破此案。黄峥的说法，正验证了这一估计。

这一估计符合常识：案子破了，而且是涉及国家领导人的大案，应赶紧处理才是。

但是，许多网友看到黄峥的说法后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侦破此案要费这么长的时间？要知道，严慰冰并非职业特工，而按照以后所了解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办事不可能十分周密，公安部难道如此无能，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才侦破此案？

严慰冰案何时侦破，是此案以及陆定一案的关键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已有权威人士回答了。1966年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这里刘少奇说得明明白白：“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但是许多人视而不见，或者说是转抄错误。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此说。说此案刚刚侦破，如黄峥说，会引起很大疑问。但是如果此案早就侦破了而迟迟不作处理，同样会引起很大疑问。这正是严慰冰案诡异之处。

实际上，余汝信先生已指出黄峥之说不符事实：1966年1月，林彪和叶群根本不在北京，叶不可能去王府井购物。（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500期，2006年5月15日）

我见到一件文革出版物上的材料，可以验证刘少奇的说法，而且具体说明此案是1963年夏季侦破的，到1966年6月不到3年，所以刘少奇说两年前并不错。

这份材料是卫生部井冈山联合战斗兵团、北京医院东风革命造反团、北医八一八追穷寇大队编的调查材料《撕开严慰冰案件的黑幕》，载1967年6月14日《八一八战报》。这材料说，早在1963年夏，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就拿严慰冰档案找中宣部核对匿名信字迹，证实匿名信确是严慰冰所为。

那么，为什么当时不处理呢？原因是怀疑严慰冰有精神病。实际上，严慰冰有不正常的行为，陆定一早知道。严慰冰攻击叶群的作为，陆定一也应早知道，当然可能不全知道。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其行为不可能严格保密。1961年，曾请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专家粟宗华医生到京给严会诊。1963年事情败露后，陆定一于11月带严慰冰到上海仍请薛邦祺等会诊。此间陆定一向薛邦祺透露了严慰冰攻击叶群的“症状”。此次会诊安排了一系列治疗。至此，严慰冰问题已无秘密可言。

事情的发展到此尚合乎逻辑。严慰冰如真有精神病，由于心理的偏执，其行为或可理解。而陆定一要做的，就是赶紧为她确诊、治疗。

然而不解之处是，当时似乎已确诊严有精神病，并为其治疗。但是并未让其休息或限制她的行动，而是仍在中宣部的工作岗位上照常上班，“参与党内机密”。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公安部尽管已侦破此案，但是他们和陆定一本人并未采取措施阻止她继续“作案”。这使得严慰冰继续投寄匿名信，乐此不疲，而且“越来越猖獗”，在1966年1月投寄了最恶毒的一封直接攻击林彪的信。这难道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如在一些侦破电影里所看到的？

此份材料说，1966年初，陆定一感到事态严重，向彭真求助。彭真于2月4日打电话给卫生部长钱信忠，说严慰冰和陆定一吵架，陆没法工作，要他安排陆定一住院。2月18日，根据彭真、陆定一的指示，由卫生部为严慰冰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诊。2月20日，陆定一到彭真家向他汇报会诊情况。此后直到3月初，又安排了两次会诊。后又于4月8日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诊。陆定一在住院期间还两次到中组部长安子文家，商讨严慰冰问题。

3月1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找李富春，李不在，又找康生，送上严慰冰会诊情况报告。康生说，中央常委未委托我管此事，叫去找彭真。11日，彭真打电话叫张子意、许立群去，给他们看严慰冰匿名信照片，指示要安排严慰冰离开中南海。此时中央已决定抛弃陆定一。

这份材料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调查材料。从其涉及的有关细节看，有一定可信度，虽须有其它材料佐证。但无论如何，我们以前所见的种种有关说法，看来编造的成分很大。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信口胡说或人云亦云，拿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糊弄读者，将历史真相弄得混沌不清。

以上提出的疑问，正是人们不肯相信刘少奇之说的原因。当然我们不能像文革中那样，将它解释成什么“政治阴谋”。我想，此问题自破案后两年多未获得解决，主要原因就是陆定一在中宣部炙手可热的权势所致。

这一案件的细节值得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此份材料未涉及到的中央在1966年初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策过程，以及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 原载《记忆》第76期 2011年9月30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